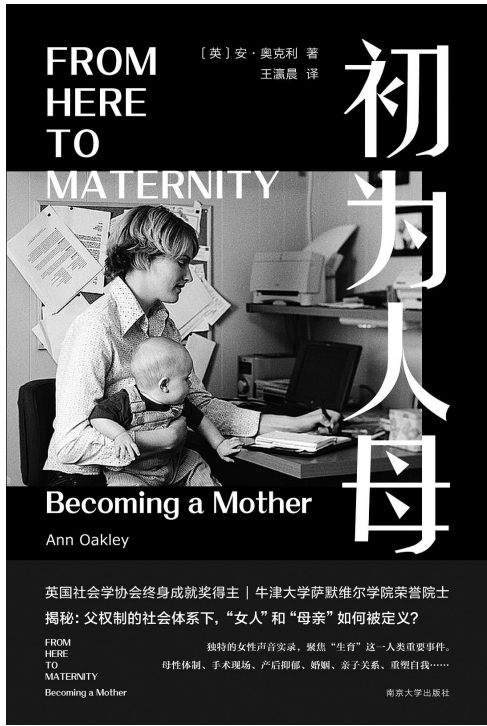


新书馆

阅快递

《初为人母》:成为母亲的独特经历



英国社会学家、作家安·奥克利长期致力于性和性别、家务、分娩、身体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研究。在《初为人母》中,她收集整理66位母亲的访谈,了解她们“生儿育女”的经历,旨在帮助女性在“初为人母”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达到充分的自我认知。本书在初版37年后,作者及其采访团队,对当年受访者中的36位进行了再次访谈。

■ 夏丽柠

诗人乔治·艾略特说,“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不难想象,艾略特的母亲,听闻此言,内心一定被儿子的深情暖化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都明白,成为母亲,谈何容易,这是一场从生理到心理的人生裂变。其中的五味杂陈,只有成为母亲的人,才有权述说。

《初为人母》(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是真正聆听母亲之书,由英国社会学家、作家,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教授安·奥克利撰写。作为英国社会学协会终身成就奖得主、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荣誉院士,奥克利教授长期致力于性和性别、家务、分娩、身体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研究。《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也是其代表作。

本书通过收集整理66位母亲的访谈,了解她们“生儿育女”的经历,旨在帮助女性在“初为人母”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达到充分的自我认知。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初版37年之后,作者及其采访团队对当年受访者中的36位进行了再次访谈。

相较初版,本书增加的内容,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对话。受访者不再是羞涩的20岁出头的姑娘,而是年龄在55至70岁之间的女性。她们在经历生死疾病、工作变更、人际变化、乔迁辗转之后,又重新回忆起年轻时经历的事。不论对读者还是她们自己,重谈“初为人母”的人生经历,具有非凡意义。

选择成为母亲,并不简单

法国社会人类学研究者皮埃尔·克拉斯特,在《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中,便别开生面地描述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的分娩场景:母亲皮楚基在奋力生产,而丈夫显出了极度的焦虑与不安,因为在部落里,有妻子生产会给丈夫带来不祥的传统信仰。

但现代社会,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束缚下,反而认为女性应该以生育为天职。“成为母亲”,成了一种隐形“制度”。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体制里,不分性别,人人都是重要的生产力。现代社会无法为几个孩子,放弃女性劳动力。奥克利在书中强调,“品鉴当今工业化社会中母性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当前的母性历史上具有独

特性”。如此说来,“选择成为母亲”的决定也并不容易。

书中,得知怀孕,受访者中有52%的人感到高兴,38%的人情绪复杂,10%的人惴惴不安。这说明,超过一半的女性对生育有期待,甚至将这个过程浪漫化。奥克利对“备孕”做了耐人寻味的描述,她说,夫妻间所谓的怀孕计划,无非就是想要的一方情感占上风的委婉表达。无论如何,因怀孕导致的身体及心理变化,标志女性迈出了成为母亲的第一步,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就女性而言,成为母亲,意味着有可能“放弃工作,待业在家,隔绝或是结交新朋友;再到婚姻、母子关系、生产时的医疗管理带来的影响等”。由此看来,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某个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体女性历史上的里程碑。

从分娩到养育,带来诸多变化

随着现代医学进步,借助诸多药物与技术手段,自然分娩与女性的距离越来越远。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孕妇不停地奔波在去医院做各种检查的路上,有时感觉自己不是孕妇,更像个病人。而且,医院为孕妇设置的所有检查,好像只有一个目的: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有些产妇甚至觉得自己像个生育的工具,只是生产中的一个环节。

身边人对孕妇的态度,同样令其不堪重负。如果说男性同事的另眼相看,使孕妇有些许不适的话,那么丈夫对怀孕的妻子的视而不见,更令她们匪夷所思。其中一位受访者的丈夫委屈地辩解,没有看到孩子生出来之前,他总想不起来妻子怀孕了,仍然像平日一样,支使她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分娩,意味着疼痛与危险。尽管当时开始采用“硬膜外麻醉水”缓解分娩痛苦,但仍有很多孕妇拒绝使用。而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麻醉水依然会由于患者体质或者有基础病而产生副作用,甚至失去生命。

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保孩子还是保大人”的情节,它的确实实在在每天发生在产房门外。由此引发的“生育权”的问题,至今难有结论。与母亲和孩子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医院标准化的分娩流程里,仿佛不值一提。

养育,为母亲带来了人生决定性的变化。据统计,女性患有“产后抑郁”的概率从5%至80%不等。究其原因,是对不确定的忧虑,以

及育儿经验不足的焦虑。没有一位初为人母的女性是训练有素的。由此,与生俱来的母性和医学养育产生了冲突,正如至今持“母乳喂养”还是“吃奶粉长大”两种不同观念的人,仍然泾渭分明。就像一位丈夫抱着初生的婴儿,激动地说,终于看到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了。而一旁卧在产床上的母亲鄙夷地想:他不是早就来了吗?从我肚子里,他的生命就开始了。

生儿育女,爸爸去哪儿了

在生养这件事上,父亲始终处于模糊地位。奥克利在书中写道:“父亲的作用好像局限于贡献精子;而母亲则意味着承担拉扯的重任。”

事实上,父亲也同样承受着生儿育女的重大压力。由于新生命的到来,父亲的生活也被打乱了。我们的社会又常常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父亲,认为“父亲是买面包的人,母亲则照顾家里”。

现代女性经常用“丧偶式育儿”调侃父亲。殊不知,新生爸爸与妈妈一样,毫无经验可谈。而且,男卫生间里没有给宝宝换尿布的设施,好像这个社会从未期待过男人做这种事。若想成为真正的爸爸,恐怕得从换尿布开始。

随着孩子的到来,夫妻关系也产生了极大波动。怀孕时,夫妻都很兴奋,因为那是双方共同的成就。小孩出生,新生命点燃了双方的温情,夫妻感情达到了顶峰。然而,当照顾婴儿成了母亲的责任之后,双方的感情也随之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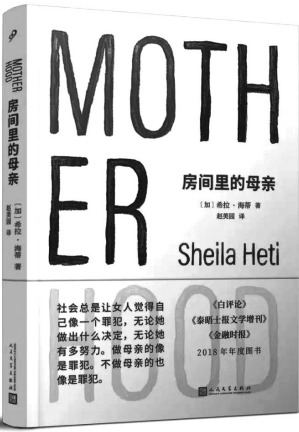
即便父亲表现积极,也未必能缓解家庭政治紧张局势。如果女性从怀孕开始,就放弃了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这种家庭分工,等于女性做了两份工作,同时为孩子与大人服务。几乎所有家庭中,家务分配都是争吵的导火索。

正如奥克利所说,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划分为不同的角色。将一个孩子带大,是份孤独的工作。无论女性多么想要孩子,多么想照顾孩子,由此带来的生活中机会和选择的减少,需要母亲进行自我考量后,去长久承受的。

在受访者中,成为母亲,认为是困难的,仅占36%。由此可见,成为母亲的经历,依然是很多女性生命中最独特,最值得回忆的高光时刻。

无论是否选择成为母亲,希望每位女性朋友的人生里,都能为自己自由的灵魂,唱起一首歌。

《房间里的母亲》



[加] 希拉·海蒂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本书是加拿大作家希拉·海蒂半自传性的小说,也是女作家为生育和生存意义焦虑的内心独白。“我”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作家,在即将告别育龄的时候,突然对是否应该和已育有一女的伴侣迈尔斯生孩子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我”通过占卜试图获得让自己平静的答案,也开始追溯家族其他女性的个人史,比如从外祖母受挫的人生,比如母亲为了追求事业、长期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给子女带来的长期困扰。

《女人与母亲:从弗洛伊德至拉康的女性难题》



[法] 马科斯·扎菲罗普洛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女人需要什么?”对此,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着不同的回答,弗洛伊德的回应是成为理想化的母亲,拉康的回应则是成为欲望的对象。为了在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作者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人类学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对之进行批判,运用大量社会学、人类学的材料,利用学科交叉所带来的他者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本优秀的探讨女性问题的精神分析人类学著作,值得精神分析领域的专业人士或对中国的女性问题希望获得有深度思考视角的人加以参考。

《斑马》



傅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32岁的苏昂在经历三次先天复发性流产后,与丈夫平川在生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对生育的渴望和对自我的探寻,促使苏昂独自上路,来到泰国寻求PGS技术的帮助。旅途中的相遇与重逢,为她打开了一个充满奇观与未知的斑斓世界。

(言浅 整理)

品鉴坊

步行社区:激发社区生活的潜在效应

步行社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镇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格局走向。在《步行可及——创造大众的宜居社区》一书中,菲利普·兰登游走于美国多个州地,深入探究成功的步行社区的物质特征、人性世态、社会历史变迁,访谈当事人物,提供了步行社区的经典营造范本和具体营造指南。

■ 黄怡

如果想对当今美国城市日常生活样态有一个横断面的了解,菲利普·兰登的《步行可及——创造大众的宜居社区》(文汇出版社2022年2月版)无疑是合适之选。这本温和而智慧的大众普及读本,为我们显示了步行社区的生活场景塑造、步行活力创造和日常生活世界的面貌建构。作者游走于美国多个州地,深入探究成功的步行社区的物质特征、人性世态、社会历史变迁,访谈当事人物,提炼汇聚成书。

步行社区是丰富而多元的,这是由社区自身的空间人文地理差异决定的。书中选了六个规模差别很大,历史背景迥异,社会经济条件不等的社区。它们又具有某些共同而重要的特征,比如空间密集紧凑,土地用途和活动混合,步行网络便捷。

步行可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在于步行社区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如书名揭示,步行可及是创造大众宜居社区的关键窍门,以步行尺度组织起来的地方是最宜居的地方。步行社区的健康效应和生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其健康、低污染的生活方式优势正日渐突显。而下述三种效应则是潜在的,隐藏于书中那些各有千秋的案例内。

促进地区经济的活力

步行社区与经济效应。2007年美国住房市场低迷、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城市开发几乎停滞不前,此时美国人最感兴趣的居住选择不是郊区的传统邻里地产,而在老的城市邻里、市中心、以前的工业区,以及紧凑的城郊。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长期徘徊,正如费城

市民觉得“不再富裕”“这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步行而放弃开车。年轻人、相当多的“婴儿潮”一代和退休人员都蜂拥至城市邻里。城市步行社区的兴起或曰回归,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生态主张,毋宁说是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市民理性权衡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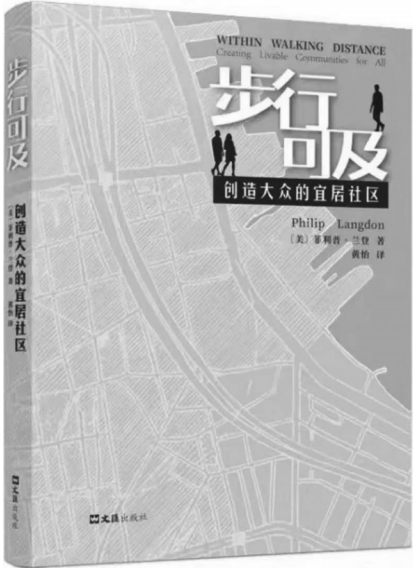
步行社区的形成反过来又客观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活力。无论是费城中心城区、波特兰珍珠区,还是布拉特尔伯勒小镇,邻里社区中步行可以到达的咖啡屋、酒吧、商店和其他便利设施,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复兴。芝加哥“小村庄”移民邻里的墨西哥特色商业,与墨西哥裔居民的各色街头贩卖一起,共同构成了富有活力的社区经济。适合步行的社区,已然成为增加地区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种手段。

更隐微的,成功的步行社区是在其人际关联和商业利益的动态变化中取得了某种平衡,亦即居民步行活动增加,经济活力增长,但又不至于将充满生机的社区吸引点变为喧闹的地区/区域中心,干扰社区生活。

积极推动社会发展

步行社区与社会效应。虽然环境决定论、物质形态决定论因太过绝对或自负往往遭诟病,但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的确会由糟糕的城市形态造成或加剧,幸而这种影响具有可逆性,像气候变化、社会公正、肥胖、隔离等诸多问题可以通过吸取土地使用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减少,步行社区以及其他恰当的生活方式选择,就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功能良好、适合步行的社区,可以赋予人们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特殊力量。适合步行的社区是对邻里生活空间与社会活动的细密



安排,步行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核心的社交要素,给予人们在步行社区体验中获得的满足感,引发居民对于个体与社区密切关系的思考,对于生活目标和意义之类的思考。这些目标和意义并不一定使生活变得更容易,但一定使得生活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费城西南中心城区是一个被视作“绅士化”的地区,新迁入的居民家庭通过不懈的参与,充分发挥了个体嵌入社区的能动性,推动一个被城市管理忽视的地区转变为一个安全、适合步行的邻里,这正是步行社区社会效应的重要体现。

在促进种族社区融合、解决中低收入就业、包容差异等社会功能上,步行社区同样具有积极持久的推动效果。芝加哥“小村庄”移民邻里地区的帮派争斗已有历史,为了与帮派成员争夺街区空间,社区团体鼓励居民们“走出去”,以温和的方式驱赶帮派,用图画取代帮派涂鸦,通过体育运动引导邻里的男孩走上正途。而布拉特尔伯勒小镇居民接纳差异、相互支持的社区氛围,与其迷人的空间营造一样,持续吸引着过往的外来者。